

“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图书

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前沿研究丛书

过剩人口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基于“过密化”与全球化视角的历史反思

赖涪林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LIXIN ACCOUNTING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前沿研究丛书

过剩人口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基于“过密化”与全球化视角的历史反思

赖涪林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LIXIN ACCOUNTI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剩人口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基于“过密化”
与全球化视角的历史反思 / 赖涪林著. —上海: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0.12
(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前沿研究丛书)
ISBN 978-7-5429-2725-5

I. ①过… II. ①赖… III. ①农村-劳动力转移
-研究-中国②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中国 IV.
①F323.6②F3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488 号

责任编辑 方士华
封面设计 周崇文

过剩人口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基于“过密化”与全球化视角的历史反思

出版发行	立信会计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 2230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电 话	(021)64411389	传 真	(021) 64411325
网 址	www.lixinaph.com	E-mail	lxaph@sh163.net
网上书店	www.shlx.net	Tel:	(021) 6441107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申松立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625	插 页	2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 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429 - 2725 - 5/F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订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 前沿研究丛书”总序

伍柏麟

历经 30 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现实,中华文明浴火重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乐观的预言认为 20 年后的中国经济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但即使在这种高速增长和乐观预期的氛围中,更需要认真思考和审视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虽然我们离开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架已经是如此之远,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一种新的我们不太熟悉的经济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但又在许多方面模糊不清。

改革的实践与问题对既有的理论和观点提出了挑战,可以说从改革伊始,经济学界就存在着争论与分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体来看,是改革的实践在检验理论的生命力,而不是相反,抱残守缺与盲目崇拜都不足取。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长期受到前苏联和斯大林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和内容已经严重落后于改革的实践,同时也出现了大量无法简单运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范式来解释的现象。在新的历史背景与发展阶段,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需要以新的参照系和新的视野来审视改革问题,从学科融合的角度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明辨改革的成败得失,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提炼改革的大思路。目前最为关键和迫切的问题是重新审视关系到中国社会繁荣与和谐发展的制度层面的问题。

从制度层面来透视中国的经济问题,至今仍是一个热门话题,中国

的改革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与丰富的素材,已成为推动经济学研究的大金矿。年青一代的经济学者生逢其时,面对今天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变化,以及伴随而来的诸多现象与问题,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就可以回答和解释得了的,在接受国际学术范式的同时我们更关心本土问题。通过对本土问题的近距离观察、理解和透视,我们才可能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研究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正是在这种信念与欲求的驱使下,我们组织和编辑了这套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丛书,丛书计划采取开放式,由编委会长期负责选择、推荐符合丛书精神和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著作陆续出版。首批选定的书目共计六本,分别是《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中国:人口过剩与土地改革》、《从商品、产权到行为空间——制度与契约分析的意义、局限及超越》、《药品价格管制的经济分析》和《宪政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等。尽管丛书的作者有着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不同学术背景,所研究的问题涉及对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中国的人口过剩与土地改革、产权改革、药品价格管制、宪政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其总体特征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某一层面进行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思考。

其中,桂勇博士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重新研究与解读,重新从宏观方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与所有权、与社会动员的关系,从微观层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权力、产权、与社会行动者关系。范剑勇博士尝试用 Krugman 新贸易理论中的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理论来分析改革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强调地理因素与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互为因果关系。他的研究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本质上是与人口聚集互为因果循环的累积过程,而这个机制对西部地区的含义是加快西部农民

向当地城市迁移,以便促进本地的制造业发展。赖涪林博士将中国土地改革全面放在世界经济背景与世界土地改革和自耕农制度变革运动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通过对佃富农和佃中农经济的实证分析,揭示了新地主、佃富农、佃中农和游民无产阶级等阶层反映出来的中国社会变化中的经济学逻辑关系;揭示了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的内在历史关联,并从土地改革追溯了决定现代中国土地制度某些经济特征的历史性规定与制约。李健博士则通过对企业的本质、边界、产生及存续理由、相关制度和契约以及“企业所有权”、“控制权”、“剩余控制权”等诸多问题较深入的梳理,对国企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王耀忠博士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应用信息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经济理论,重点研究了药品价格管制的理论、发达国家药品价格管制的经验,以及对中国目前的药品价格管制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王小卫博士应用宪政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了尝试性解释,认为“计划经济”的概括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传统经济体制内在的政治经济关系,提出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全能政府及其所界定的权利结构为支撑的经济系统,经济转型过程是权利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并把经济转型界定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型与决定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游戏规则转型两个层次。针对政府—市场二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宪法—政府—市场三分法的分析框架。

丛书的作者都具有博士学位和在国内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对于学术研究具有极其虔诚的态度,已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在国内与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部丛书是他们对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奉献的一份绵薄之力,以期通过与学术界的交流和碰撞来推动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这套丛书的顺利完成,首先感谢学术界同仁的慷慨支持,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本套丛书的撰写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还要真诚感谢丛书责任编辑方士华先生,正是由于他的敬业精神和辛勤劳动,才使这套丛书能如此迅速地与广大读者见面。

目 录

序 章 从“过密化”到全球化

——一个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视角	1
---------------------------	---

第一章 从市场经济看中国的人口与土地问题

12

第一节 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12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与土地问题	20
--------------------------	----

第三节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与土地问题	29
---------------------------	----

第二章 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下的中国土地改革

37

第一节 全球土地改革时代与中国土地改革	37
---------------------------	----

第二节 中国土地改革的社会历史前提	44
-------------------------	----

第三节 从过剩人口看中国土地改革的性质	57
---------------------------	----

第三章 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的社会历史关联

66

第一节 “农民土地所有”的内涵	66
-----------------------	----

第二节 土地改革以后的新农民问题	72
------------------------	----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必然性	80
-----------------------	----

第四章 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	93
第一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乡镇企业	93
第二节 “土地流转”的目标与现实	106
第三节 农村土地资源资本化的制度困境	119
第五章 全球化影响下农村劳动力的非稳态转移	139
第一节 农村劳动力非稳态转移的理论思考	139
第二节 我国农民工非稳态转移的现状	147
第三节 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156
第六章 我国当代社会变革的理性反思	169
第一节 中国在全球化潮流中的艰难抉择	169
第二节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讨	181
第三节 我国当代社会制度改革之我见	190

序章 从“过密化”到全球化

——一个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视角

本书是一本从过剩人口与土地制度的关系讨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著作。

迄今为止,我们曾经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近代化理论来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然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将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修改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表明我国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而且这一调整目前仍然没有完成。一方面,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很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还不能给出有较强说服力的解释。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日渐深入和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逐渐回归,西方经济学的近代化理论至少在经济学领域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的趋势。然而西方经济学理论虽然经过不断的批判、补充、修正和改造,形成了非常精细、非常固定、非常严密和非常系统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但仍然难以找到克服“市场失灵”等市场经济自身缺陷的方式。而且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基本范畴和分析范式,也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更为重要的是,伴随西方经济学近代化理论汹涌而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潮流,使经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资源和占领市场,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趋势。而且作为全球化动力的资本扩张式经济发展受到了全球经济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呈现为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目前不管是西方经济学的近代化理论本身,还是由其引领的全球化潮流,都因

为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受到了市场经济发展周期性衰退和挫折的困扰。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中国缺乏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积累,因此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在中国一直“水土不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绝大多数方面还处于落后的地位,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很难改变中国的弱势地位,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能力;而且中国是一个超级的人口大国,但却在经济资源和能源的占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中国的全球化历程基本上是一个被动地应付资本主义全球化挑战的过程,走得无比艰难曲折。虽然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血雨腥风、洋务运动的蹒跚学步、辛亥革命的大喜大悲、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文化大革命”的癫狂与任性、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中国社会仍然尚未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

中国迫切需要更加符合社会实际的理论引领社会变革。因为我们正站在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入口处。虽然全球化已经是一股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但有条件的逐渐融入使我们保留了寻找制高点的主动权,把握适当的理论可以更好地引领中国变劣势为优势,开创一条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化道路。

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探讨需要科学的态度。

首先,需要继承过去的理论成果。应该说,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共产主义不仅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在道德层面上也与人类对真善美和正义、真理的追求相吻合,而且不失为超越市场经济的一个可贵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现代经济发展的解释能力和指导作用都比较明显,甚至被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视作经济学霸权主义,表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学科的限制。因此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探讨,应该兼收并蓄这些理论成果的精华。

其次,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探讨更应该全面地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理论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总

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是人口与土地,而美国学者黄宗智教授提出的“过密化”理论,主要解释了在人口严重过剩条件下,农民将难以向外流动的劳动力要素密集投入到有限的土地资源上的现象。该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精华,更好地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因此本书将以要素配置理论为基础,以“过密化”和全球化为基本分析视角,将过剩人口与土地制度的关系作为基本线索,重新认识中国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挑战的过程,并从中获得帮助我们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的理论启示。

黄宗智教授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曾经借鉴吉尔茨研究印尼水稻生产时使用的“过密化”(又叫“内卷化”)概念,提出了著名的“过密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人口过剩地区,家庭农场并不总是能够从手工业、商业等部门找到多余劳动力的出路,于是常常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因此在生计的压力下,自耕农的小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为多。虽然农业总收入增加,但必定会降低单位劳动的报酬。这种劳动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使边际报酬收缩或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甚至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黄宗智教授认为,过密型商品化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但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的提高。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于促使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

延续小农经济。他认为从明清以来,华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经济便出现了过密化发展,而且从明清、民国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的解体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所呈现的增长都仅仅是一种“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即“过密型增长”^①。

除此以外,美国学者杜赞奇也借鉴吉尔茨的“过密(内卷)化”概念,提出了“政治内卷化”的主张,认为传统国家的权力在通过经纪体制深入到乡村社会的过程中,由于机构膨胀,因此面临不断增长的资源要求。但经纪体制的存在致使国家提取的租金不能大幅度增长,因此只能通过不断复制或扩大原有的赢利经纪体制,来获得资源提取数量的绝对增加。而相对于国家规模而言,这种体制的经济效益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递减^②。范志海则主张,内卷化机制存在三个不同表现层次:农业内卷化或经济内卷化——农业或经济有增长无发展的状态;国家内卷化或政权内卷化——旧有的国家或社会体系的复制、延伸和精致化,社会逐步丧失容纳新成长因素和制度创新的内部机制,以及文化内卷化——旧有的习俗、习惯参与的社会复制与精致地定格各种秩序^③。甘满堂甚至提出,农民工流动中由于有很强的制度惯性,因此存在农民工体制的内卷化与农民工阶层流动的内卷化现象^④。

吉尔茨使用“过密(内卷)化”概念,主要描述了印尼爪哇地区的农业呈现一种生态稳定性、内向性、人口快速增长和高密度的耕作过程;其中交织着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的二重经济的复杂性和整合性,但又属于缺少有效技术方法和工业要素引入的传统农业。并认为这种社会状况所具有的高度弹性和松软的不确定性,允许调整、吸收、采纳,但不

① 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范志海:《论中国制度创新中的“内卷化”问题》,《社会》2004年第4期。

④ 甘满堂:《社会学的“内卷化”理论与城市农民工问题》,《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支持真正的社会变迁,因此当社会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一种高级模式,反而在内部不断复制、延伸和精致化。而且内卷化的消极后果表现为长期的人口膨胀与资源枯竭的危机^①。很显然,吉尔茨对爪哇地区社会发展的观察是以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为参照体系,因此发现了大量用市场经济难以解释的社会现象。实际上黄宗智、杜赞奇和其他学者也都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参照体系,来分析非市场经济的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现象。这些用市场经济难以解释的社会现象遵循的是不同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这种社会体系显然并非向着市场经济的所谓“高级模式”发展,而是展现了另外一些自我延续、自我更新或所谓“超稳定”的发展模式。

黄宗智教授从我国历史中抽象出的所谓“过密化”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农业生产者在土地资源要素严重不足而劳动力资源要素严重过剩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而且纵观中国的历史长河,除了农业生产者对劳动力过于密集的投入以外,还存在许多长期形成的不计成本、不考虑要素的合理配置,“集中动员人力物力办大事”的各种政治、宗教和文化等非市场化的要素配置机能,以及利用这些机能克服劳动力要素过剩而其他要素严重不足的局限,缓解社会过剩人口压力的社会自我调整机制。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显然还会通过这些要素配置机能和自我调整机制,沿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和王朝更替的路子继续发展下去。但鸦片战争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强烈冲击,严重干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轨迹,激化了中国社会过剩人口压力的矛盾。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化解或缓和过剩人口压力的矛盾,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阵痛以后,最终选择了通过土地革命向“过密化”的自我调整机制回归。

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强烈冲击中国传统社会带来的结果来看,黄

^①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宗智教授关于“帝国主义入侵以后,中国小农经济在结构和变动方向上仍然基本延续着过去趋势”的判断值得商榷。因为在受到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猛烈冲击(鸦片战争及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包括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与日本、俄国、法国等的反殖民战争、义和团、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等重大的历史变革与历史事件,也包括在社会各个领域里发生的各种细微而深刻的变化。恩格斯曾经指出:“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①

统计数据显示,在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1912—1936年间则为9.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说明中国经济在民国时期获得了快速增长。在这一时期,国家通过户籍里甲、赋税徭役和宗族血缘等超经济剥削方式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有一定程度的削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晏阳初、黄炎培、米迪刚、王鸿一、陶行知、梁漱溟和卢作孚等爱国知识分子精英推进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建设运动,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乡村社会的变迁。例如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一方面,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另一方面,农村的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②。

①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4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② 何建华、于建嵘:《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5年第3期。

更值得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深入农村也是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学术界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开展了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关注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为原料、市场、生产结构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在资本主义深入农村的诸多表现中,辛亥革命以后应运而生的“新地主”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社会政治权力和宗族血缘关系配置经济资源、能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方式(逐渐向市场化过渡)。按照经济学理论,这些改变导致的结果是提高了经济资源、能源和其他生产要素配置的流动性和合理性。然而其中农村劳动力配置流动性的提高对于中国社会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在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中间,通过所谓“过密化”发展隐藏了大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农村劳动力配置流动性的提高导致了农业经营合理化程度的提高,农业中过剩配置的劳动力必然通过市场化的力量(主要是基于生产经营能力的自耕农和佃农的农业经营竞争)被排除。结果导致两极分化:一部分生产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户成为富农、“佃富农”和“佃中农”等中上层农业生产经营者,更多的农户却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其中一部分人被迫退出农业生产经营,沦为雇工、贩夫走卒和无业游民等。正是因为大量隐藏在过密化发展过程中的弱小农民被赶出了土地,而弱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根本无法吸收这么多过剩人口,因此这些过剩人口的生存危机演变为巨大的社会危机,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土地革命的发生。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土地改革的原因和性质。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仅面对的是一般所说的地主制度内部的矛盾,而且更主要的是面对由于农村社会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使庞大的过剩人口从传统农村和农业中被剥离出来,以及由此而导致全社会的动荡不安的状况。由于土地改革的分地对象包括大量非农业人口在内的过剩人口,产生了大量既无资本又无经验和经营能力的小土地所有者,因此我国土地改革的目的实际上并不是实现真正的农民的土地所有,而是通过给予过剩人口土地的方式来缓解被激化了的过剩人口矛盾。我国土地改革除了将一些经营地主、富农、佃富农、中农和佃中农的土地给予

全部或部分剥夺,从而极大地缩小他们的经营规模,削弱他们的经营能力以外,新产生的农民很多根本没有种田经验、缺乏资本和农业经营能力。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农村地区很快就不得不面临如何解决这些缺乏农业经营能力和经营条件的所谓“农民”的问题。因此,土地改革以后并没有积极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所有”这个成果,而是很快将其否定,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合作化。与其说土地改革以后的农业合作化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或者是为了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以及为了抵抗国际政治关系的压力等,还不如说是我国土地改革本身(或者中国农村现实本身)所具有的缓解过剩人口矛盾的特征,使接下来发展农业合作化成为历史的必然结果。

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以后,中国农村经济确实又重新回到了黄宗智教授所说的“过密化”状态。农业合作化以军事组织为基础,通过行政权力来强化行政与经营的结合,主要通过生产资料的集中利用和劳动力的集中使用,以劳动力密集投入为特征的集体所有与集体经营。这样的合作化通过特别方式的集中管理,在农田水利、土地整理和土地的集中利用以及农业技术进步等方面获得了一定程度规模效益递增的结果,实现了总产出、土地生产力(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和所谓的“恶平等”,从而使过剩人口问题得到了大大缓解。所呈现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只是通过所谓“过密化”的方式暂时回避了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人口压力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中国的人口数量在短短的30年中间在人民公社的母体内迅速膨胀了将近1倍。

正是由于“过密化”的发展是“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所以这种模式的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较量中始终处于下风。经过“大跃进”、“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不断折腾以后,我国“过密化”经济逐渐走入了死胡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展,被人们称为“第二次土地改革”。这一改革否定了“过密

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社会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再次融入全球化的潮流。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廉价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市场开放和牺牲生态环境等,在一定程度上换来了外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已经成功地转移了两亿多农村劳动力(根据国务院研究室 2006 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提供的数据)。

以上从“过密化”和全球化的角度,对中国应对全球化潮流冲击过程做了一个概要性的把握,并清晰地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正好经历了从过密化到全球化、再回到过密化,又重新全球化的两个轮回。但是,一方面,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还保留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制度安排,例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有经济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等。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再度全球化已经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在恢复市场流动性的同时,再次彰显和激化了过剩人口的矛盾冲突。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到 2006 年年底,我国农村的劳动力资源总量为 5 亿多人,其中农村从业人员接近 4 亿 8 千万人,第一产业接近 3 亿 4 千万人。2006 年我国的耕地面积为 1 亿 3 千万公顷(根据《关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成果的公报》数据),如果按一个从业人员经营 1 公顷(15 亩)耕地的标准,则至少还有两亿多农业从业人员可以转移出来。而且已经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里面临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城市里处于边缘化状态,很难在城市里定居下来,并完全融入市民社会中去,而且随时面临失业重新回到农村的危险。这样的转移并不是市民化的完全转移,而是未完全脱离农村的半定居或不定居的非稳态转移。

不仅如此,虽然中国才刚刚跨入现代化的大门,但目前的经济规模已经消耗了太多的经济资源和能源。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 年,